学术前沿 · 清代中国的对外形象、认知与交往

编者按： 17—18 世纪是清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疆域广大、民族众多、国力强盛的清代中国与东亚、中亚乃至世界其他地区进行交往并产生重要影响。本期刊发的四篇论文分别探讨了 18 世纪朝鲜王朝对文天祥的认知与崇祀、17 世纪清朝与朝鲜的咨文往来和交往原则、乾隆朝接待中亚各部朝觐使团的礼仪及其政治功能、清朝对哈萨克诸部认知的书写与演变，有助于我们通过从周边与世界看清代中国、从清代中国看周边与世界两个维度深入认识清朝对外交往的理念、实践与影响。

忠义与正统：朝鲜王朝对文天祥的认知与崇祀

孙卫国

[摘要] 文天祥系中国历史上著名忠义人物，受到尊崇，也成为朝鲜王朝追捧的对象。朝鲜燕行使在北京时常瞻拜文丞相祠，《文山集》数度刊行，朝鲜君臣熟知文天祥生平事迹，成为朝鲜历史人物比附的对象。1750 年，赵显命从北京购来文天祥画像，英祖君臣多番讨论，最终安置在永柔县卧龙祠中，与诸葛亮、岳飞一同崇祀，此庙变成朝鲜之“三忠祠”。卧龙祠建于宣祖年间，肃宗扩及岳飞，英祖再添入文天祥，使之成为朝鲜崇祀中华英烈的重要场所。这与大报坛崇祀明朝皇帝的意义一样，系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又一重要象征，宣示朝鲜王朝坚守中华正统。

[关键词] 文天祥 诸葛亮 卧龙祠 中华正统 清代中朝关系史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3）－05－0022－015

中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半岛有着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汉字、书籍、政治制度等方面，成为朝鲜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也体现在思想文化认同，甚至英雄崇拜上。古代朝鲜王朝不仅学习儒、释、道思想，也对中国历史上所崇拜的英雄人物，予以接纳和尊崇。即如文天祥（1236—1283）系中国历史上备受推崇的忠义人物，在朝鲜王朝（1392—1910）后期也颇受尊奉。朝鲜王朝在“尊周思明”的氛围下，不仅刊出了洪启禧所编三卷本《文山先生详传》（此传较之中国宋、元、明、清所刊行的任何一部文天祥传，部头更大，分量更重，宣扬文天祥的英勇事迹），且将文天祥画像置于永柔县三忠祠中，与诸葛亮、岳飞一道，岁时祭奠。文天祥崇祀，被纳入朝鲜王朝

[收稿日期] 2022-11-09
[作者简介] 孙卫国（1966— ），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 300350；sunwgx@126.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韩国汉文史部文献编年与专题研究”（21 & ZD242）阶段性成果。

尊奉先贤体系之中，[①] 成为他们日常政治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考察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不仅有助于理解朝鲜王朝后期政治文化特色，深入认识朝鲜王朝正统观的思想内涵，也从一个甚少关注的视角，深化对明清中朝关系史的认识。

一、元明清对文天祥的尊奉

文天祥，初名云孙，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庐陵人。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中进士第一，为状元。元军南下，文天祥招募士卒勤王，率师北上，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与元军议和，却被元帅伯颜拘留，被押解北上。途中逃脱，九死一生，终得南归。与张世杰、陆秀夫在福州拥立益王赵昰称帝。祥兴元年（1278），他在广东五坡岭被俘，再度被押往大都，被囚三年，坚贞不屈，遂被杀害。

文天祥就义后，一直被书写，“友人如王炎午祭之以《文》，汪元量招之以《歌》，谢翱哭之以《记》，皆为千古传诵之作。至如公柩之返葬，夫人之南归，郡县之祠公学宫，乡人之梓公文集，以及顺天柴市之立祠，文山旧居之建庙，明时之追赠谥号，清代之入祀文庙，皆与公之事迹有关……至其他郡县所建公祠，后人吊公之诗文，则所在多有，记不胜记”。[②] 他的事迹被一代又一代追忆，他的精神不断被颂扬，他的形象也不断被诠释和建构，终成为中国历史上忠义楷模。最早撰写文天祥传记的，都是文天祥同时代人，甚至是其知交好友，即如邓光荐、王幼孙等，他们代表着宋末元初南宋遗民的想法。他们尽可能挖掘文天祥的忠义事迹，一方面寄托追思和崇敬，另一方面也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在这些宋末遗民笔下，有关文天祥的叙事，并没有被置于明显的华夷观主导的话语体系中，主导书写的是儒家政治伦理所确定的忠臣典范。元朝官方决定着文天祥的生死，也对后世文天祥形象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元朝虽然杀了文天祥，但并不否认他的忠义精神。《宋史·文天祥传》论之曰：“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③] 称颂文天祥杀身成仁，系一伟人。

明朝以程朱理学立国，尤其重视道德教化，从明太祖开始，就十分推崇文天祥。明代儒士们不断追叙文天祥的故事，重写他的传记。文天祥的形象在明代重新从记忆深处被挖掘出来，并加以建构。朱元璋立国之初，在南京建庙，岁时祭祀文天祥，同时敕封文天祥为天下都城隍之神。永乐年间，在北京重修文天祥庙，后来成为朝鲜使臣经常拜谒之处。明英宗时期，文天祥被追封谥号为“忠烈”。[④] 正德六年（1511），尹直为敕建文天祥等勇士螺山忠义庙撰写庙碑。文曰：“肆我太祖高皇帝，统一区宇之后，即祀公就义之所。永乐初，复饬公祠。景泰中，又易公名。孝宗皇帝特允臣言，建庙称禋溥及督府诸忠义。一时台省忠良，奉扬休命。贤愚歆慕，

---

① 中、韩学术界对于朝鲜王朝崇祀文天祥之事，并无专论，下面论著或多或少涉猎此事。白新良主编：《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陈功林：《文天祥形象的塑造与演变》，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年；朴现圭：《韩国诸葛亮庙宇的由来和现况》，《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2 期；赵士第、徐添：《朝鲜君臣的文天祥记忆（1401–1887）》，《国际汉学》2022 年第 1 期；安章利：《鄭夢周와 文天祥의 忠臣像 比较》，《圃隱學研究》第 12 辑，2013 年；金成奎：《岳飛와 文天祥小傳》，《건지인문학》第 11 辑，2014 年；安淳台：《조선조 文天祥의 충절에 대한 논의 연구》，《遯巖語文學》第 39 辑，2021 年。李炫植：《「文丞相祠堂記」, 북학의 논리와 대비의 미학》，《古典文化研究》第 21 辑，2002 年。

② 杨德恩：《文天祥年谱·例言》，商务印书馆，1939 年，第 2 页。

③《宋史》卷 418《文天祥传》，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25403 页。

④《明英宗实录》卷 270，景泰七年九月乙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 年，第 5735 页。

益知人臣死忠，弥久弥彰，而感激之心，勃勃如也。”[①] 明朝之所以如此重视褒奖文天祥，“目的当然是为了激发士大夫的忠诚孝义，为现实人臣和民众树立一座道德教化丰碑和人格典范，以便为公共道德和政治秩序服务”。[②] 宣扬的依然是他的“忠义”精神。

清初颁布薙发令，激起江南汉族士人的反抗，他们将发肤与文明礼仪结合起来，视同文明的象征，他们反复传诵中国古代忠臣义士的诗文，或自比，或自勉，文天祥则是反复被提及的。黄道周为南京弘光朝尚书，其曰：“磊磊轩天地，旗古今，则必以文信国为正焉！”绝命词曰：“乾坤有半壁，何忍道文山！”[③] 复社领袖杨廷枢言：“余自幼读书，慕文信国先生之为人，今日之事，乃其志也！”仿文天祥《正气歌》作绝命诗十二首，第一首就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气千秋应不散，于今重复有斯人。”[④] 文天祥为抗清志士之一致选择，因为当时南宋帝后皆已投降，文天祥所效忠的不再是帝王，而是“华夏中国”，[⑤] 南明诸臣有几乎相似的历史处境，故皆自比文天祥。清廷虽同样重视文天祥，对文天祥也给予很高地位，康、雍、乾三帝都对文天祥有过褒扬之词，道光年间，文天祥得以从祀文庙，但清朝官方所强调的是他的忠义形象，而消除其“华夷”之别的象征。[⑥]20 世纪初，文天祥被赋予现代新的意义，在清末民初的革命运动中，在传统华夷之别的基础上，他又被视作民族英雄。

除了南明（清初）和清末特殊政治环境，文天祥形象在清代仍然延续此前的主流叙事，在君臣关系的范畴而非民族维度中被视作忠义代表而受到推崇。恰恰是南明那种忠于“中华”、反抗“夷狄”的文天祥形象，虽为清廷官方所淡化，却在朝鲜王朝大讲特讲，其深受朝鲜现实政治及中朝关系的影响，被赋予“尊华攘夷”的象征意义，形成一个类似于中国又富有鲜明特征的文天祥形象，成为朝鲜王朝尊崇文天祥的一个鲜明特点。

二、朝鲜君臣对文天祥忠义形象的认知

作为中国的藩属国，朝鲜王朝对于明朝，诚心事大，极为恭顺；对于清朝尽管缺乏政治文化认同，但也谨尽藩国义务。朝鲜使臣每年都来北京，时常瞻仰文天祥祠、三忠祠等，留下不少诗文，表达对文天祥的崇敬之情，也寄托对现实的某种关怀。[⑦] 随着《宋史》《文山集》等相关典籍传入朝鲜半岛，朝鲜君臣也越来越熟知文天祥的生平事迹。在朝鲜王廷经筵、日讲中，他们经常讨论文天祥的传奇经历；越到后期，他们对于文天祥的事迹也越熟悉，不仅常将朝鲜人物，如郑梦周、李舜臣、姜沆、赵宪等比附文天祥，每每借文天祥说事，而且将文天祥这位中国历史人物，逐步融入他们认知范畴，最终接纳他为朝鲜所尊奉的忠臣先贤，赋予新的象征意义。

（一）朝鲜王朝对文天祥全方位的认知

燕行使在北京时常瞻仰文丞相祠，留下不少诗文。在朝鲜王朝君臣日常政治生活中，中国历史人物时常被议论，文天祥也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讨论之中。

首先，一代又一代朝天使来到明朝首都北京，瞻仰文丞相祠与三忠祠，表达崇敬之情；而进入清朝以后，燕行使则更多表达悲凉之意。弘治十一年（燕山君四年，1498 年），朝天使曹伟

---

① 尹直：《敕建螺山忠义庙碑》，刘文源编：《文天祥研究资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 176–177 页。

② 顾宝林、欧阳明亮：《明代对历史人物风范的记忆与建构——以文天祥为例》，《河北学刊》2014 年第 1 期。

③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 8《黄道周志传》，任道斌、魏得良点校，中华书局，1984 年，第 314、321 页。

④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 4《杨廷枢血书并诗》，第 256–257 页。

⑤ 高岚：《“忠臣”与“烈士”：清王朝的治国方略与汉族认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5 期。

⑥ 陈功林：《文天祥形象的塑造与演变》，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年。

⑦ 赵士第、徐添：《朝鲜君臣的文天祥记忆（1401–1887）》，《国际汉学》2022 年第 1 期。

拜谒文丞相祠后，连写五首诗，题为《谒文丞相庙》，第一首曰：“丞相祠堂何处寻，天街北畔凤城阴。清风肃肃庙庭邃，遗像堂堂岁月深。去国肯摇苏武节，存刘不愧孔明心。百年忠义留天地，烈日秋霜照古今。”① 对文天祥忠义大节深表敬意。

乾隆中期以后，随着会同馆门禁的解除，朝鲜燕行使外出拜谒的机会就更多了，即如蔡济恭、洪良浩、金昌集、金昌业、洪大容、朴趾源、赵显命、金景善、朴思浩等都留下了拜谒文丞相祠或三忠祠的诗文。燕行使一方面不厌其烦地介绍北京文丞相祠、三忠祠的沿革，另一方面对祠庙的破败时常表达一种悲凉心境。如 1712 年，金昌业瞻仰三忠祠后写道：“庙宇荒凉，可知其香火之疏，令人尤伤心。”②1778 年，蔡济恭写道：“中州沦没古今伤，文相祠堂草木荒。惟有年年东国使，拜瞻遗像一焚香。”③1811 年，李鼎受特别写了《柴市悲》：“悲莫悲兮柴市，忠莫忠兮文山！三年燕狱万事闲，南向再拜报国身。风晦雷霁固有神，《正气歌》《衣带赞》，不独柴市过者尽沾巾！君不见辟雍南牌楼北，数间荒祠杜宇春。”④1822 年权复仁感叹道：“燕中丛神，淫祠在在，崇奉像设炫耀，唯岳庙、文祠荒寂圮废。余谓西山可夷也，琉璃厂可碎也，五龙亭、雍和宫可拆也，武穆、信国二祠，将岿然独存，与天壤同弊也！”⑤ 道光年间，文天祥被清朝官方崇祀文庙，清廷并没有放弃崇祀文天祥，但朝鲜燕行使们似乎看不到这点，他们所见的文丞相祠与三忠祠破败不堪，似乎文天祥早已被抛弃了，或许是他们潜意识中“尊周攘夷”思想的一种外化，某种意义上，增添了朝鲜英祖年间建立三忠祠的必要性与使命感。

其次，《文山集》由朝鲜王朝官方多次刊印，成为他们日常必读之书。《文山集》最初系文天祥孙文富在元朝时的编刊本，但传世极少。元贞二年（1296）文天祥故里刻成三十二卷本，大德元年（1297）再刻《后集》七卷，世称道体堂本。明朝以后，刻本甚多，景泰、嘉靖年间皆有刻本。明清之际，有关文天祥诗文刊本多达二十余种。⑥

《文山集》最早何时传入朝鲜，现今并不清楚。在朝鲜诸家目录书中，时有介绍《文山集》者。徐命膺所编之《奎章阁总目》曰：“《文山集》十本，宋丞相庐陵文天祥著。诗文十卷，《指南录》三卷，《集杜诗》一卷，附录一卷，并目录总十七卷。吴铨《序》云：‘《指南》二录，血泪为枯；《正气》一歌，川原动色。’历今五百年，而令人读之，凛然犹有生气。”⑦ 推崇备至。洪奭周之《洪氏读书录》记录《文山集》最详，其曰：“《文山集》二十五卷，信国公文天祥之文也。公之文章皆忠义所发，不容以高下论。然或多骈俪工致，语皮日休谓宋广平铁心石肠；及赋梅花，乃清新妍丽，不类其为人，观于公尤信。至其歌诗，沉郁悲壮，而济之以才格，殆南渡二百年所未尝有。欲观公者，读其诗与《指南录》三卷足矣。”⑧ 从朝鲜时代所流传下来的书目来看，《文山集》有十七卷、十六卷和二十五卷三种版本，十七卷本包括目录一卷，疑与十六卷本同。即便如此，也至少有两种版本流传，当系朝鲜刊行之版本。⑨

---

① 曹伟：《燕行录》之《谒文丞相庙》，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 2 册，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2 年第 171 页。

② 金昌业：《老稼斋燕行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 33 册，第 47 页。

③ 蔡济恭：《含忍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 40 册，第 379 页。

④ 李鼎受：《游燕录》卷 3《柴市悲》，林基中编：《燕行录续集》第 123 册，第 334–335 页。

⑤ 权复仁：《随槎闲笔》，林基中编：《燕行录续集》第 128 册，第 108–109 页。

⑥ 近藤一成：《文天祥的“自述”与“他述”：以〈文天祥全集〉的编纂为中心》，尤东进译，《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10 期。

⑦ 徐命膺编：《奎章阁总目》，张伯伟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 1 册，中华书局，2004 年，第 368 页。

⑧ 洪奭周：《洪氏读书录》，张伯伟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 8 册，第 4330–4331 页。

⑨ 当今中国流行的《文天祥全集》版本，多为二十卷。卷 1 至卷 12，诗文；卷 13《指南录》（又分 4 卷）；卷 14《指南后录》（分 3 卷）；卷 15《吟啸集》；卷 16《集杜诗》；卷 17《纪年录》；卷 18《拾遗》；卷 19–20《附录》，载历朝有关文天祥的传记、祭奠诗文、文集序跋等。《四部丛刊》本、熊飞等点校本皆同。前 17 卷为原文，想必朝鲜王朝流行之 17 卷本，与此应大同小异。

《朝鲜王朝实录》中，朝鲜君臣讨论《文天祥全集》，最早记载于朝鲜成宗二十四年（1493）正月。当时，侍读官俞好仁启曰："《文天祥集》，忠愤激烈，实为诗史，使人读之，自有感慨之心，印颁何如？"① 此本很可能就是景泰刻本。俞好仁建议得到批准，于是朝鲜翻印《文天祥全集》，以广其传，成为朝鲜士人日常阅读的典籍。至少从成宗年间开始，《文天祥全集》就已是朝鲜君臣阅读的书籍。后来在宣祖、仁祖、英祖年间，朝鲜君臣都讨论过《文天祥全集》刊行问题，最终都付诸实施。可见，此书一直在他们的阅读范畴之内，加上《宋史》等史书也逐渐传入朝鲜，客观上为朝鲜君臣了解文天祥生平事迹，提供了文献基础。文天祥也由此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符号，被引入朝鲜王朝的日常政治之中。

再次，朝鲜君臣在阅读有关文天祥典籍的基础上，时常援引其事迹，为其政治主张提供合法性依据。成宗七年（1476）八月十三日夕讲时，都承旨玄硕圭言："节义，国家之大防也，古之人臣如文天祥者，世不多有。"侍讲官李孟贤曰："以唐、宋二代观之，唐享国三百余年，及其亡也，无一人尽节而死。宋朝享国四百余年，及其亡也，僻处一隅，衰乱极矣。如文天祥、张世杰，皆以忠义自奋，至于杀身而不顾，忠臣之多，莫过于宋。此岂一朝一夕所能致哉……愿殿下修名教，以培养士风。"② 在朝鲜人看来，文天祥是士人节义的化身，大臣向国王进言，希望国王倡导，以形成儒生崇尚节义、杀身成仁的士风。

中宗九年（1514），经筵夕讲《宋鉴》，大臣许硡劝谏国王应该崇奖节义，以培植国家之元气，认为宋代之所以出现像文天祥、陆秀夫这样的节义之士，乃是历代宋朝皇帝"仁厚之德"所养成的。③ 几天以后，二月二日，讲到文天祥至燕京，许硡曰："文天祥在元，则乃敌国之臣也，嘉尚节义，供张甚盛。大抵人君必崇奖节义，扶植纲常，然后大防立而人心定矣。"④ 事实上，在这期间，朝鲜君臣就"崇尚节义"之事，展开过热烈讨论，君臣一致认为当学习宋朝，"褒奖节义"。

英祖君臣经常讨论中国历史，宋末这段历史就是他们经常讨论的话题。英祖二年（1726）十二月十五日，经筵读《宋鉴》，英祖与侍读官诸臣讨论宋末史实。英祖君臣认为，宋末忠臣义士多，以文天祥、陆秀夫为最，乃是宋代文教，尤其是濂、洛、关、闽之学大盛的结果，也就是程朱理学的影响。如果宋末诸帝早用文天祥、陆秀夫等人，或许宋朝国事不至于此，早就能够寻找到救国之策。但文天祥也不被时人所知，陆秀夫的史实也未能写入《三纲行实》之中。忠臣事迹湮没不闻，是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憾事。⑤ 第二天夜对之时，讲《宋鉴》元世祖、成宗卷，侍读官金龙庆再次指出文天祥这样忠臣的出现，是"宋三百年培养之效"，⑥ 强调文教的重要性。英祖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大司宪赵观彬向英祖表示，宋末会出现文天祥、陆秀夫这样的节义之士，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受到朱熹理学的熏陶，系宋代朱子学倡导义理之结果，且他自称是当代的文天祥。⑦

可见，朝鲜君臣经筵之时，经常讨论中国历史人物，文天祥是经常被提及的人物。或以其经历说事，多强调他的忠义精神。尤以英祖时期为著，也正是在英祖年间，发生了将文天祥画像入三忠祠之事，而文天祥的形象又增添了新的意义。下文再论。

---

① 《朝鲜成宗实录》卷 273，成宗二十四年正月丁丑，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刊:《朝鲜王朝实录》第 12 册，1955—1958 年，第 268 页。

② 《朝鲜成宗实录》卷 70，成宗七年八月癸未，第 9 册第 373 页。

③ 《朝鲜中宗实录》卷 19，中宗九年正月壬辰，第 14 册第 707 页。

④ 《朝鲜中宗实录》卷 20，中宗九年二月丙申，第 15 册第 2 页。

⑤ 《承政院日记》第 628 册（脱草本第 34 册），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原本，英祖二年十二月壬申，原书无页码。

⑥ 《承政院日记》第 629 册（脱草本第 34 册），英祖二年十二月癸酉。

⑦ 《承政院日记》第 733 册（脱草本第 40 册），英祖七年十月丁巳。

最后，朝鲜王朝不仅刊印由中国传入的《文天祥全集》，英祖年间洪启禧还编成了三卷本《文山先生详传》，较之中国现代以前任何一种文天祥传，部头更大，分量更重。

文天祥三十七岁时，因为得罪权臣，自请致仕，也成为朝鲜诸臣经常比附的一件事。朝鲜史书中，对于文天祥未满四十即致仕，但国事日乱之时，又出山救国，每每称颂。有曰："人臣事君，富贵，虽有难进之操；临乱，必无退避之意。故宋臣文天祥年未四十而致仕，若将终身于田野。见其宗社将危，国事已去，则志决扶颠，竭心殚诚，死而后已。"① 国难之时，毅然出山，迎难而上，这种精神每每为朝鲜君臣所称道。朝鲜国运多艰，壬辰倭乱，丙子胡乱，丁酉胡乱，战乱不断，在此危难之时，文天祥的精神常常为他们所推崇，成为他们尊崇的楷模与比附的对象。

对于文天祥全方位的叙述，莫过于英祖时重臣洪启禧所撰成的三卷本《文山先生详传》。书前有《文山先生详传序》，落款为"崇祯之三壬申（1752）日南至南阳洪启禧谨序"，此书完成于 1752 年。书前有"文山先生小影"，附邓光荐、王幼孙赞辞。然后是《续资治通鉴纲目所书文山先生事》，接着分"天、地、人"三卷，叙述文天祥的生平事迹。序文将文天祥视作宋代儒贤三百年培养的结晶与代表，是宋代儒士忠义最杰出的代表；同时强调文天祥既然忍受非人的折磨，体现其尽"人臣之义理"，并非系一代之兴亡，而为"万世"之标杆，"为人臣者之标准"，可与诸葛亮并称，共同作为忠义的典范。② 此书综合了《文天祥全集》《宋史》以及中国宋元明清各种文天祥传记资料而编成，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③

（二）朝鲜儒士对"黄冠之对"的辩说

所谓"黄冠之对"，出自《宋史・文天祥传》。据载，文天祥羁押大都之时，忽必烈派王积翁去劝说文天祥投降，文天祥表示，如果释放他回家，他愿以"黄冠"归故乡，也就是成为道士，且可以为元廷"备顾问"。④ 此论在中朝史上都引起很大争论，是影响评判文天祥忠义精神的关键问题，故而单独讨论。

明人解缙辩驳曰："盖《宋史》作于元盛时，故于丞相事特诬陋。至云丞相求为黄冠等语，欺罔尤甚！顾岂足为丞相轻重哉！然恐相袭讹谬，不可不辨也。"⑤ 特别指出是元官修《宋史》的污蔑之词，强烈表示文天祥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王世贞也说："凡闽僧之告'星变'，'中山狂人'之欲'起兵'与诏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方外备顾问'之言，毋亦馁乎？然此非公之志也。留梦炎之不请释公，虽以害公，其为知公者矣。即不杀公而公竟以黄冠终，不可也。即公不以黄冠终而有所为，必败；败而死于盗贼之手，以歼其宗，而夷赵氏之裸将，亦未可也。然则公之为宋尽矣，其亦可以死矣。"⑥ 也强调所谓"黄冠之对"，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根本不可能是文天祥的自我叙述。

对于文天祥的生死观，英祖君臣有过讨论。英祖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国王与大臣读《宋元纲目》，谈到文天祥最后时刻的生死抉择。对于文天祥在元大都羁押三年不死，而遭人非议之事，朝鲜君臣以为这是完全不了解文天祥心思；文天祥绝食八天后没死，而再进食，并非文天祥舍不得死，而是他顺应天命，另有心志，也并非能随意揣测的。并进一步解释宋亡元兴的原因，认为宋朝虽有文天祥、陆秀夫这样的忠臣义士，最终还是被元朝灭亡，是因为宋朝有忠臣

① 《承政院日记》第 74 册（脱草本第 4 册），仁祖十八年五月壬辰。

② 洪启禧：《文山先生详传・序》，朝鲜英祖间刊本。

③ 孙卫国：《历史书写与现实诉求：朝鲜王朝洪启禧〈文山先生详传〉考释》，《世界历史》2022 年第 2 期。

④ 《宋史》卷 418《文天祥传》，第 12539 页。

⑤ 解缙：《萧文琬父子督饷于空坑》，刘文源编：《文天祥研究资料集》，第 217 页。

⑥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 110《文天祥》，《明代论著丛刊》，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年，第 5198−5199 页。

而不用，却用小人；元朝虽为夷狄王朝，但善用人才，故能战胜宋军。① 这实际上是借讨论文天祥等宋末史事，表达重用忠臣之重要性。

朝鲜儒士对“黄冠之对”，有专文辩驳。他们不相信《宋史》的说法，更不相信文天祥会有这样的想法。有人担心朝鲜儒士们对此有误会，特地撰文解释，认为文天祥这么说是有深意的。肃宗时期著名学者金春泽特作一篇史论，详细分析文天祥“黄冠之对”的说法。他认为，忽必烈派王积翁劝降文天祥，文天祥说：“倘蒙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所以王积翁劝忽必烈释放文天祥，让他出家为道士。但作者以为即便忽必烈释放了文天祥，“吾知天祥必以为吾既不能死于国亡之日，万一得脱而归者，当求赵氏儿于民间。纠乌合之众，励尺寸之兵，以图兴复而已。虽知势之不成，或冀天之助顺，不成则死，是又吾事也云耳。”文天祥只要活着出去，他的目标就是要兴复赵氏江山。留梦炎颇了解文天祥的心思，故而劝忽必烈杀了他。作者特别强调：文天祥早就置生死于度外，他曾作诗“妻兮莫望夫，子兮莫望父”，“是其捐性命与家族也素矣”。② 因为担心有朝鲜人会误解文天祥之意，所以特别为文天祥辩解。

英祖时期著名儒士徐宗华则另有解释，认为文天祥有“恶死之心”和“号召遗民而图恢复”的说法，“二言皆非知文公者”，不足为据，而另立他说。“自戊寅被执，至燕狱五年之间，无非求死之日，而终不得死，其为恶死者耶？”而所谓以“黄冠之身”，图恢复之意，时移世易，宋室早已消亡，“四体已冷，天意人心，盖可见知”，故亦非其意。既然如此，为何会有“黄冠之对”呢？他以为文天祥乃效仿微子、箕子，期待元主“变夷为华”，既不怕死，也不一味求死，“安于时，顺于义”也。③可见，朝鲜文臣的两种解说，都是为文天祥所谓“黄冠之对”辩护，无论是寻赵氏后裔以复国，还是期待元主“变夷为华”，都是朝鲜儒生的美好想象。这样的解说在中国明清并未见到，也显示出朝鲜对于文天祥的忠义形象有更加美好的寄托。

（三）把朝鲜大臣比附文天祥

在朝鲜君臣不断建构文天祥形象的同时，他们也经常将本国历史人物，如郑梦周、赵宪、姜沆、宋时烈、金尚宪等比作文天祥，④ 因为这些人物都被视作朝鲜忠义的化身。太宗元年（1401）正月十四日，参赞门下府事权近应诏上书，其中第五条“褒节义”曰：“自古有国家者，必褒节义之士，所以固万世之纲常也……窃见前朝侍中郑梦周……其心岂不欲厚报于太上！且以才识之明，岂不知天命人心之所归！岂不知王氏危亡之势！岂不知其身之不保！然犹专心所事，不贰其操，以至殒命，是所谓临大节而不可夺者也……文天祥死于宋，而元世祖亦追赠之。梦周死于高丽，独不可追赠于今日乎？”⑤ 尽管郑梦周是因为忠于高丽而死，但其忠君报国的节义精神理应得到弘扬，故权近劝太宗效法元世祖追赠文天祥的做法，以追赠郑梦周。此后，朝鲜君臣就经常将郑梦周比作文天祥。

宣祖重臣尹斗寿特作《成仁录》一书，将郑梦周与文天祥的忠义事迹编为一书，大肆褒扬。⑥《成仁录序》中，将二人对比，讴歌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精神。以为他们生于宋末

---

① 《承政院日记》第 857 册（脱草本第 47 册），英祖十三年九月己酉。

② 金春泽：《北轩居士集》卷 9《初年录 · 史论 · 文天祥（黄冠之对）》，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 185 册，1997 年，第 128–129 页。

③ 徐宗华：《药轩遗集》卷 8《文山愿以黄冠备顾问论》，韩国古典翻译院编刊：《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集》第 76 册，2009 年，第 338–339 页。

④ 韩国学者涉猎过此问题，参见安章利：《鄭夢周와 文天祥의 忠臣像比较》，《圃隱學研究》第 12 辑，2013 年。金成奎：《岳飛와 文天祥小傳》，《건지인문학》第 11 辑，2014 年。

⑤ 《朝鲜太宗实录》卷 1，太宗元年正月甲戌，第 1 册第 191 页。

⑥ 安章利《鄭夢周와 文天祥의 忠臣像此较》重点讨论了《成仁录》中对于郑梦周与文天祥忠义形象塑造的异同。

与高丽末，时代相似，都处于风雨飘摇的王朝末世，但是他们为了“万世之纲常”，历经苦难，最终捐躯报国；二人贞忠大节，若合符契，共同留名节于万世。① 此书影响很大，朝鲜性理学大师李珥为其添上郑梦周画像，因郑梦周后人郑俊一对英祖说：“臣之十二代祖与文天祥同节，故合为一册矣。臣家亦有梅竹帖，皆是名臣硕辅画像也。” ② 可见，从朝鲜初年开始，朝鲜君臣就将郑梦周比附文天祥，成为朝鲜儒生的一致看法，看重的正是他们的忠贞节义精神，大加宣扬。

壬辰倭乱之时，朝鲜刑曹左郎姜沆被日军俘获，带往日本。姜沆想方设法逃回朝鲜，上书向宣祖国王请罪。对于自己被日军俘虏一事，姜沆自比文天祥，认为被俘不可怕，即便像文天祥这样的忠臣义士也难逃被俘的命运，其“忠诚”之义，丝毫不比他差。姜沆自比文天祥，不仅为当朝君臣所信服，也为后世所称颂。③《朝鲜显宗修改实录》言：“倭人盛称其节义，至比之于苏武、文天祥。” ④ 比附文天祥，这对于被比之朝臣来说，是莫大之荣耀。孝宗三年（1652）六月二十五日，议政府左议政金尚宪卒。《朝鲜孝宗实录》论之曰：“古人谓文天祥收宋三百年正气，世之论者以为，天祥之后东方唯尚宪一人而已。” ⑤ 把金尚宪比作文天祥，且言东方一人而已，评价之高，前无古人。英祖三十三年正月十六日，英祖召见诸大臣议事，有朝臣因为地名相同，提议将文天祥追配赵宪祠，英祖当场反驳“文天祥岂可配享于赵宪耶”！ ⑥ 这句反问，有相当丰富的内涵。文天祥作为宋末忠臣，系上国的忠烈典范，在朝鲜只能作为崇奉的对象，是朝鲜诸臣效仿的楷模，焉能反过来将他的牌位追配于朝鲜先贤赵宪的祠中呢！事实上，朝鲜君臣每每将赵宪比作文天祥，但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君臣礼仪，主次分明，绝不能随心所欲乱来。

综上所述，朝鲜燕行使常在北京拜谒文丞相祠和三忠祠，君臣不仅十分熟悉文天祥的生平事迹，成为经筵之中时常讨论的话题，也编出了近代之前篇幅最大的《文山先生详传》。朝鲜儒士对于历史上有所争议的“黄冠之对”，也有非同一般的解说，以维护文天祥的忠义形象。朝鲜君臣十分尊崇文天祥，将朝鲜王朝忠义人物都比附文天祥，一方面对于被比附之人是一种莫大荣幸，另一方面也表明在朝鲜人看来，文天祥是忠义人物标杆，是他们学习的对象，顶礼膜拜的楷模。这种忠义形象的认知跟中国元明清的认知类似，正体现同为儒家文化的中国与朝鲜，同样看重朝臣的忠诚。当然也有不同，即如对于文天祥“黄冠之对”的解释，无论说是要寻赵氏之后，复大宋江山，还是说要“劝夷为华”，都是朝鲜士人所寄予的不同想象，有着深深的朝鲜烙印。但英祖年间，朝鲜燕行使购来文天祥画像之后，朝鲜将文天祥纳入崇祀的对象，则更增添了一种“尊华攘夷”新的正统象征意义。

三、英祖君臣对文天祥画像入祀之争论

朝鲜王朝崇祀文天祥，发生在当政在位时间最长的英祖国王（1724—1776）时期，也是朝鲜王朝后期倡导“尊周思明”最为热衷的时期。当时朝鲜臣服清朝百余年，朝鲜君臣以为“胡无百年之运”，时常担心大祸临头。英祖国王在宫中扩建大报坛，将原本只崇祀明神宗的大报

① 宋秉璿:《渊斋先生文集》卷 24《成仁录序》，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 329 册，2004 年，第 433 页。

② 《承政院日记》第 949 册（脱草本第 51 册），英祖十八年九月甲戌。

③ 《朝鲜宣祖实录》卷 111，宣祖三十二年四月甲子，第 23 册第 598 页。

④ 《朝鲜显宗改修实录》卷 19，显宗九年四月辛巳，第 37 册第 607 页。

⑤ 《朝鲜孝宗实录》卷 8，孝宗三年六月乙丑，第 35 册第 562 页。

⑥ 《承政院日记》第 1140 册（脱草本第 63 册），英祖三十三年正月戊申。

坛，推及明太祖和崇祯帝，尽管受到朝臣激烈反对，英祖国王强力推行，最终如愿。① 恰在此后不久，朝鲜燕行使从北京购来文天祥画像，由此又激起英祖国王强烈的崇祀欲望，因为文天祥画像为其倡导“尊周”思想，增添了一个新的象征符号。

诚如前面提到，自 1637 年臣服清朝，成为清朝藩国后，朝鲜每年都派燕行使前往北京。乾隆中期以后，使行人员可自由游览北京城，他们常拜谒文天祥祠，写诗文纪念。即如朴思浩《文丞相祠堂记》，描述北京文天祥祠的情形，包括地理位置、格局大小、塑像形貌，并特意记录祠位版及匾额上的文字，凸显祠堂本意在于强调文天祥的忠义精神；末引《大兴县志》，说明文天祥就义情形以及祠庙修筑经过，褒扬有加。② 也有关于北京三忠祠的记录，“三忠祠即诸葛武侯亮、岳武穆飞、文文山天祥三塑像妥灵之所”。③ 朝鲜王朝英祖年间，仿效北京三忠祠，将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神位置于一庙之中，将卧龙祠改为三忠祠，这样朝鲜半岛也就有了崇祀文天祥的庙宇。

朝鲜王朝宣祖年间，在平安道永柔县建造了卧龙祠。宣祖二十五年（1592），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三个月内，朝鲜三京陷落。宣祖只得北狩，从汉城到平壤，最后落脚义州。1593 年正月，明军收复了平壤，宣祖搬到永柔，驻留数月。宣祖获悉永柔县有卧龙山，当即联想到诸葛亮，即有意建庙。1594 年，平安道监司遂在永柔卧龙山修建武侯庙，并立碑。一则表达宣祖国王在壬辰倭乱时期，想求像诸葛亮一般的股肱之臣；二则也表彰永柔县民的忠诚，弘扬其忠义精神。④ 肃宗年间，在讲求“尊周思明”的氛围下，岳飞牌位被移入其中。而将文天祥画像置入卧龙祠中，乃因有燕行使臣从北京带回了文天祥画像。英祖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燕行使赵显命向国王禀报，他从北京得到文天祥画像。《承政院日记》曰：“（赵）显命曰：‘文丞相画像，臣得来矣。’上曰：‘印来乎？’显命曰：‘印来一件矣。’”⑤ 文天祥画像是由燕行使赵显命从中国印回来的，如何将其妥善处理，则成为朝中日常政治中的一件大事，君臣之间由此展开了一场权力博弈。

二月初三日，英祖与诸大臣讨论安置文天祥画像的办法。英祖最初提议在北境五国城附近建造一庙，以崇祀文天祥，以陆秀夫配享。所谓五国城，据《辽史·地理志》载，实际上是在中国辽东松花江地区，“靖康之难”，宋徽宗、钦宗二帝被俘，被押往辽东，后被囚于依兰五国城头，徽宗死在那里。⑥ 朝鲜却风闻五国城在咸镜道内，大概也是根据这个传说。英祖选中此地建庙崇祀，正是想借该传说附着的政治意义，进一步凸显君臣之间的政治伦理，“今于此处，建宇祀两人，使二帝，无臣而有臣，二忠百代之下，可以依君”。但这一提议，遭到左议政金若鲁、行副司直赵荣国和礼曹判书徐宗伋一致反对，他们强调五国城本无据可考，在此建祠，根本无从谈起。在此情形下，英祖只得暂缓讨论，由此提出第二个建议，问是否可以配享于诸葛亮庙。金若鲁、洪凤汉皆表示赞同。英祖再提议，能否将陆秀夫一同崇祀于诸葛亮庙，诸臣

---

① 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商务印书馆，2007 年；孙卫国：《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嬗变（1627—1910）》，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8 年。

② 朴思浩：《心田稿》之《留馆杂录·文丞相祠堂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 85 册，第 459-460 页。

③ 李尚吉：《朝天日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 9 册，第 210 页。

④ 《汉丞相诸葛忠武侯庙碑碑记》，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拓本（索书号：K2-4935）。据朴现圭《韩国诸葛亮庙宇的由来和现况》（《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2 期）载：英祖时期，文天祥同祭于此，武侯祠遂变成了三忠祠。1871 年，兴宣大院君拆毁全国书院，全国只留下 47 所书院。永柔武侯庙因系奉宣祖之命而建，得以保留。据《东亚日报》1927 年 7 月 10 日报道，1902 年，供奉在三忠祠的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的画像和肃宗赐的影帧都被盗走了。1927 年三忠祠殿阁只供奉着牌位和留下的三块碑石。每年端午节，男女老少会去三忠祠，欢乐数天。

⑤ 《承政院日记》第 1052 册（脱草本第 57 册），英祖二十六年正月壬申。

⑥ 有关五国城的研究，参见刘文生、张泰湘：《五国城与五国国名的破译》，《东北史地》2006 年第 1 期；于庆东：《五国城通考》，《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 年第 3 期；周喜峰：《五国城：父子皇帝“坐井观天”》，《中国文化报》2009 年 7 月 5 日。

又都反对，认为“大臣所达诚是矣，推而广之，则渐至太多矣”。[①] 在当天讨论中，英祖事先已有设想，他更为急迫地想要为文天祥建祠崇祀，选址于更能彰显君臣之义的五国城，在崇祀文天祥画像过程中，国王比大臣们更为热心，目的性也更强。但英祖却处于大臣掣肘、步步退让的窘境。

第二天，英祖与另一批大臣再次商议文天祥画像安置之事，英祖提出同样的问题。赵显命乃是将文天祥画像从北京模印回来之人，跟其他大臣回答一样，他也不同意在五国城附近为文天祥建祠，而认可将文天祥画像安置在诸葛亮庙中崇祀的办法，但也不认同将陆秀夫牌位与文天祥一同置于诸葛亮庙中崇祀，认为不能推得太广。[②] 两天两批大臣，几乎像是事先商量过似的，意见完全一样。国王没有办法，只得扩大征询意见的范围。

二月初四日晚上，同副承旨南泰耆与修撰金阳泽赞同在五国城附近修建祠庙，崇奉文天祥画像，对于陆秀夫同祀，则没有表示态度。[③] 英祖似乎受到鼓励，遂再扩大征询范围，争取得到更多支持。二月十九日，“其令礼官问于时原任大臣、儒臣，禀处事”。[④] 几乎所有被问到的朝臣皆反对英祖的两个提议，理由如前：第一，所谓皇帝陵五国城，只是一个传说，并无实据，不能当真，在五国城附近建祠缺乏依据；第二，可以将文天祥画像安置在诸葛亮祠中，但不宜将陆秀夫的牌位也置于其中，以免过于扩大。

英祖国王既然在朝中无法寻求到支持，再征询致仕乡居大臣的意见，以寻求支持。同年三月十四日派遣礼官将此事原委征求致仕家居的在外儒臣。外地儒臣大体有两类回复：一类，跟在朝诸臣一样，直接反对国王提议，认为建祠于五国城不妥；另一类以年老体衰，早就不问政事为由，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干脆采取一种不予表态的办法。[⑤] 致仕诸臣几乎没有赞同国王提议的。下面试将朝鲜诸臣对于英祖提议的意见，列为表 1。

从表 1 可知，英祖国王对于文天祥画像的安置，从一月二十八日到三月十四日，先后五次征求朝臣意见，综合而论，英祖对于文天祥画像的安置相当重视，他在经筵之时，首先提出来既然北道发现宋代皇帝陵五国城，且和《宋史》记载相合，文天祥是宋末忠臣，应该在五国城附近建祠崇祀。同时，因为陆秀夫跟文天祥齐名，也系宋末忠臣，一旦祠庙建成，应该将陆秀夫与文天祥一并崇祀。英祖分批征求朝臣意见。前三批借经筵之时，征求侍讲官看法。经筵侍讲官都是朝中重臣，位高权重。但从左议政金若鲁开始，就明确反对。认为所谓皇帝陵五国城完全没有根据，像陆秀夫这样的宋末忠臣很多，为何一定要把陆秀夫与文天祥同祀？不如把文天祥画像放入永柔卧龙祠，跟诸葛亮、岳飞同祀一庙。随之几乎每位侍讲大臣皆是这样的意见。只有第三次征求意见时，同副承旨南泰耆和修撰金阳泽赞同英祖看法。英祖见到有人支持，第四次再问金若鲁、赵显命等人，没想到他们依然坚持原来看法，没有丝毫改变。为了争取更多支持，英祖特别派礼曹官员前往各地，征询致仕家居的老臣们的意见，但只有一人提议如果要建祠也不用那么远，直接在汉城外建祠即可。其余八人全都不置可否，故意不答，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赞同。实际上明显不支持他的提议。在此情形下，英祖知道再争无益，只得顺从大臣们的意见，将文天祥画像安置于卧龙祠中。

经过与朝臣多番博弈，英祖最终也无法按照自己的心愿去崇祀文天祥画像，只得妥协。二十六年（1750）三月十六日，英祖召见诸臣，最终决定文天祥画像安置在永柔卧龙祠。英祖命承旨书传教文，向群臣表示：一是诸葛亮、岳飞、文天祥具有忠诚节义的品质，是忠臣志士

① 《承政院日记》第 1053 册（脱草本第 57 册），英祖二十六年二月丙子。

② 《承政院日记》第 1053 册（脱草本第 57 册），英祖二十六年二月丁丑。

③ 《承政院日记》第 1053 册（脱草本第 57 册），英祖二十六年二月丁丑。

④ 《承政院日记》第 1053 册（脱草本第 57 册），英祖二十六年二月壬辰。

⑤ 《承政院日记》第 1054 册（脱草本第 57 册），英祖二十六年三月丁巳。

效法的楷模，肯定三者同享一祠的做法；二是继续强调当初建祠于五国城，实际具有深意，同时表达对于陆秀夫未能入祠的遗憾；三是明确同意将文天祥同配于卧龙祠，三忠共同崇祀，并要亲制祭文与文天祥画像一道置于祠中。① 由此，君臣之间关于文天祥入祠的争论，因英祖的妥协告一段落。

表 1　朝鲜君臣对于英祖崇祀文天祥、陆秀夫提议意见表

序号	官位与姓名	于五国城处建祠的态度	崇祀陆秀夫的态度	提议解决办法	备注
1	英祖国王	倡议建祠	倡议文、陆同祀		一月二十八日赵显命献文天祥画像
2	领中枢府事左议政金若鲁	无依据，反对	担心同类过多，反对	配享诸葛武侯祠	二月初三日经筵第一次征求意见
3	行副司直赵荣国	无可据，反对	赞同立祠并享		
4	礼曹判书徐宗伋	无依据，难援例			
5	礼曹参判洪凤汉	反对	反对	配享诸葛武侯祠	
6	领敦宁赵显命	无可据的证，不可援例	反对	配享诸葛武侯祠	二月四日昼经筵第二次征求意见
7	都提调闵应洙	同上	同上	同上	
8	副提调郑必宁	同上	同上		
9	同副承旨南泰耆	无处不可，赞同			二月四日夜经筵第三次征求意见
10	修撰金阳泽	赞同			
11	领中枢府事左议政金若鲁	第二次被征求意见，依然反对	反对	配祀诸葛武侯祠	二月十九日第四次征求意见
12	领敦宁府事赵显命	与经筵时意见相同			第 2 次
13	判中枢府事闵应洙	与经筵时意见相同			第 2 次
14	右议政郑羽良			配祀夷齐庙	
15	奉朝贺金兴庆	以神志昏迷，未置可否			
16	行副护军朴弼傅	恐未合当	不予表态	于武侯祠处建祠同祀	三月十四日第五次征求外地儒臣意见
17	祭酒沈錥	叮嘱郑重	未表态		
18	进善尹凤九	五国城处边徼之地，不妥	反对	京城外择地建祠	
19	和顺县监李养源	不置可否	未表态		
20	副护军韩元震	同上	同上		
21	副护军申暻	同上	同上		
22	工曹参议闵遇洙	同上	同上		
23	咨议宋明钦	同上	同上		
24	前掌令宋能相	同上	同上		

① 《承政院日记》第 1054 册（脱草本第 57 册），英祖二十六年三月己未。

可见，从正月二十八日赵显命从北京出使回来复命，进献文天祥画像，到三月十六日最终将文天祥画像安置于永柔卧龙祠，乃是英祖国王跟朝臣博弈的结果。表面上看，似乎诸大臣在乎五国城之真伪，实际上从这种分歧中可见很多问题。试析之如下：

第一，文天祥系宋末忠臣，朝鲜君臣都认同这点，但对于忠臣的认知是否完全由国王说了算，则未必如此。朝鲜诸臣不认同英祖崇祀的地点和一并崇祀陆秀夫的建议，说明朝臣未必认同英祖国王的标准，朝鲜诸臣希望保持他们对于忠臣义士看法的相对独立性。

第二，英祖时期是极力倡导尊周思明的时期，就在前一年，因为朝臣黄景源从《明史》中发现，丙子胡乱之时，崇祯帝责令登莱巡抚陈洪范救援朝鲜，但明军尚未出发，朝鲜已经投降清朝了，英祖国王经过多次商议，最终强行将大报坛崇祀，由肃宗时期的独祀明神宗进而扩展到明太祖和明崇祯皇帝。① 这件事发生之时，大报坛扩祀讨论仅系半年前的事情，朝鲜诸臣记忆犹新，他们非常担心英祖国王会像扩建大报坛一样，由明神宗皇帝扩展到明太祖、崇祯帝；他们也担心一旦赞同英祖将陆秀夫纳入崇祀对象，说不定又会引发其他大臣被援例进来，以致难以招架。这或许是他们反对将陆秀夫与文天祥同祀的原因。

第三，将文天祥与诸葛亮、岳飞同祀卧龙祠中，实有深意焉。一方面他们都是中国的忠臣，也是朝鲜朝臣效仿的对象，表达宣扬忠义精神；另一方面，宣祖是在壬辰倭乱时期建造卧龙祠的，卧龙祠本身就表达一种捍卫领土、抗击敌寇的象征意味，而时当英祖国王极力倡导“尊周攘夷”的时代，他之所以如此热切地想另建祠庙，就是希望凸显这样的用意，使之成为另一个“尊华”的象征。如果说大报坛的崇祀是承继明朝的中华正统，那么卧龙祠崇祀诸葛亮、岳飞和文天祥，本身就是中华正统的象征。他们忠于王朝，忠于皇帝，忠于中华，也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其象征意义，暗示朝鲜高举中华正统的意义。

四、文天祥画像入三忠祠与朝鲜之崇祀

诚如前面提到，卧龙祠正是宣祖年间所建。最初修建卧龙祠，以崇祀诸葛亮，后来又将岳飞牌位置于其中，一同崇祀。今将文天祥画像置入此庙中，因为他们三人皆系忠臣，将诸葛亮、岳飞、文天祥视作“三忠”，这也是当时中朝约定俗成的说法，因为北京的三忠祠就是崇祀他们三人的。英祖也说过：“诸葛、岳武穆、文文山三人，谓之三忠。”② 卧龙祠就变成了朝鲜的“三忠祠”。对于此祠的情况，英祖曾言：“癸卯（宣祖三十六年，1603）建祠，戊申（宣祖四十一年，1608）赐额，而乙亥（肃宗二十一年，1695）配享岳武穆，庚午（英祖二十六年，1750）配享文文山矣。”③ 清晰地呈现了由卧龙祠变成三忠祠的重要时间节点。

既然决定追配文天祥画像于卧龙祠，英祖遂指令承旨写祭文，同时给诸葛亮、岳飞也写祭文，“先制祭武侯文，次制祭武穆文，次制祭信国文，各四字二十句”。④ 两个月后，朝鲜君臣商议文天祥画像安置于卧龙祠中的具体办法。左议政金若鲁曰：“当此疠疫炽盛之时，役民一节，不可不念，姑令待秋举行无妨矣。”礼曹判书申晚跟国王讨论崇祀文天祥画像的具体办法，主要讨论了一些崇祀的细节：当初追配岳飞之时，立了碑，但没有祭文，今当将岳飞与文天祥同撰祭文。金若鲁觉得时当春疫泛滥之时，不如秋成之际再做，得到国王批准。同时，因为听当地官员讲，卧龙祠相当宽敞，崇祀诸葛亮和岳飞，空间很大，为文天祥追加一个牌位，绰绰有余，故祠庙无需扩建。文天祥画像追享之时，依从崇祀诸葛亮和岳飞的办法，“以位版奉安”，“画像

① 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第 134—144 页。

② 《承政院日记》第 1018 册（脱草本第 55 册），英祖二十三年七月乙卯。

③ 《承政院日记》第 1307 册（脱草本第 73 册），英祖四十六年七月己丑。

④ 《承政院日记》第 1054 册（脱草本第 57 册），英祖二十六年三月己未。

则别为藏置”。规定一年春、秋两祭，统一格式。[①] 从牌位、祭祀方式、具体陈设情况等等方面，文天祥的牌位跟诸葛亮和岳飞一样，“三忠”一视同仁。

建祠地点与方式商量好后，无需重新建祠，也不需要扩建卧龙祠，只是在祠中摆上文天祥的牌位即可。最后批准，文天祥画像的奉安致祭日为六月初二日，[②] 由左副承旨洪益三去完成。七月二日，洪益三复命。英祖详细询问其情况，包括既有卧龙祠整体情形，其阁制大小与新旧等；也有具体细节，如画像、御笔是否安置妥当等。洪益三一一作答。[③] 从中可见，卧龙祠很大，有三间庙舍，诸葛亮、岳飞、文天祥各占一间，从左到右排列，诸葛亮居左，岳飞居中，文天祥居右，卧龙祠重新粉刷一新。英祖细致询问大小事宜，可谓相当重视，对他而言，也算完成了一件大事。

既然将文天祥与诸葛亮、岳飞一同安置在三忠祠中，英祖就经常派大臣前往祭奠。英祖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英祖召见致祭承旨郑尚淳入侍，特别询问祠庙情况：“上曰：‘卧龙祠大乎？丹雘如何？’尚淳曰：‘不甚大而皆画像，诸葛武侯则纶巾羽扇，而文丞相在西，岳武穆处东矣。’上曰：‘注书出去，持卧龙祠致祭祭文以来。’臣承命出去，奉祭文入来，上命尚淳读之。上曰：‘不觉垂涕矣！祭物如何？’尚淳曰：‘有羊、豕，而无牛矣。’上曰：‘悬板已悬之乎？’尚淳曰：‘自监营往悬之矣。’上曰：‘此后三忠祠致祭时祭文，称‘有汉’‘有宋’，头辞‘维岁次’下，只书某年干支事，定式施行。”[④] 从中可见卧龙祠的规模以及祭祀情况。郑尚淳的汇报跟十几年前洪益三的汇报有些不同，规模不甚大，而三忠牌位的安排也不同，郑尚淳只介绍了画像。祭品有羊、猪，无牛。英祖特别提出祭文中的正朔，称“有汉”“有宋”，没提“有清”，也不用清朝年号，只书干支，以凸显在“尊周攘夷”氛围之下三忠祠的中华正统象征意义。

英祖四十六年七月初九日，英祖因阅读与武侯祠相关的文献，由此生发一番感慨，其言甚长，恕不全引，综合而论，乃英祖就卧龙祠追慕宣祖之意，有感而发。主要有几点：第一，此事起因乃英祖与诸朝臣读《礼曹誊录》中建造卧龙祠时的《宣庙教文》和大臣李敏叙的疏文，进而再读《岳武穆配享备忘记》和《文文山配享备忘记》，实际上追叙卧龙祠创建、拓展、延伸的始末，由诸葛亮到岳飞再到文天祥的变化过程。英祖颇有感慨。第二，对于宣祖建祠之意，赋予深刻的象征意义，英祖大加阐发。“义州聚胜堂、永柔梨花亭、海州芙蓉堂，皆追慕。而前后亲书揭板，此亦少伸微忱，亦何复谕？”这一类祠庙甚多，皆表示宣祖追慕先贤忠烈之意。第三，英祖特别提到“因卧龙祠，近八闻此，是岂偶然”，英祖国王已年逾 76 岁，年近八旬，因为卧龙祠而知悉宣祖追慕忠臣之意，其大有深意。第四，宣祖卒于戊申二月，卒前还亲赴庆运宫，赐馔卧龙祠所在地“永柔文、荫、儒、武在京者，曾任永柔县令者”，[⑤] 以示优礼。次日，英祖亦效仿宣祖做法，赴庆运宫给来自永柔县的诸臣赐馔；同时指令当地道臣给当地年逾七十以上的臣民在梨花亭中共食，各赐帛一匹，以表追怀之意。

正祖十年（1786），在宫中发现肃宗国王御制赞三忠图像三本，遣官移奉三忠祠中。正祖亲作祭文三篇。祭文天祥曰：“乌乎文山，际时不造。平生姱节，周苌唐杲。燕山柴市，白日虹贯。英魂上征，侍帝香案。一幅传神，独留人寰。云劫漫漶，绘素犹完。眉目山河，衣带仁义。往迹昭森，不待青史。有海东流，鲁连所蹈。地称小华，祠建净土。选谷移奉，公像在堂。有

---

① 《承政院日记》第 1056 册（脱草本第 58 册），英祖二十六年五月戊午。

② 《承政院日记》第 1056 册（脱草本第 58 册），英祖二十六年五月庚申。

③ 《承政院日记》第 1058 册（脱草本第 58 册），英祖二十六年七月壬寅。

④ 《承政院日记》第 1224 册（脱草本第 68 册），英祖三十九年十一月丁丑。

⑤ 《承政院日记》第 1307 册（脱草本第 73 册），英祖四十六年七月己丑。

觩者卣，尚歆清香。”[①] 表达深深的追慕与崇奉之情，特别强调“地称小华，祠建净土”，以凸显其中华象征意义，并令平安道观察使赵璥作《三忠祠祭文》曰：

> 是祠也，当诸葛公之始享也，孰知夫岳公、文公之次第同祀乎！而我肃庙特旷感于三忠，图其形，赞其烈，表章之如一。我圣上又为之移奉于是祠，与英庙御笔灿然并耀，其为兹土之荣，詟乎大矣……噫！今去三忠之世已远矣。然其大节之感人，赫赫如昨日事。而我先王尚贤之德，我圣上述事之孝，又有以鼓动而兴起焉。兹土之人，苟有秉彝之天者，其岂不油然而激感乎！夫大节三忠之迹也，秉彝人人之心也。因其迹而求之于心，能尽夫所秉之彝，则其修身也，斯可以明志致远矣；其率职也，斯可以尽忠报国矣；其立命也，斯可以成仁取义矣，夫然后始谓之激感兴起而不负于朝家鼓动之化也。兹土之人，可不勖哉！[②]

此文先交代三忠祠的创建经过，然后特别强调从宣祖开始，经肃宗、英祖，到正祖年间，莫不重视三忠祠。宣祖开创此庙，肃宗年间将岳飞添入此庙之中，当时此庙还并非三忠祠，肃宗就为三忠图像御撰赞词，似有先见之明。英祖迁入文天祥画像，最终使之由卧龙祠变成三忠祠，这不仅是朝鲜宣扬忠义的重要场所，也是朝鲜确保正统的一个象征。诸葛亮、岳飞、文天祥之所以被视作“三忠”，乃因为他们既忠于朝廷，更忠于中华。而朝鲜王朝肃宗国王以来，尤其强调中华大义，肃宗在明朝灭亡六十周年之际，在昌德宫后苑建造大报坛，以崇祀明神宗皇帝；英祖将其扩建，并推广到明太祖和崇祯帝。朝鲜王朝自认为承继了明朝以来的中华正统。三忠祠的建设，由诸葛亮扩展到岳飞，最终到文天祥，他们是中国历史上忠义之臣的代表，是中华正统的另一个象征。

五、余论

在宋朝已灭亡、皇帝投降的情形下，文天祥依然忠心耿耿，他所忠的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在中国随后历朝皆强调这种忠臣义士的精神。在朝鲜“尊周思明”的氛围之下，文天祥的忠义精神依然在，文天祥的忠义形象又被赋予了一种“尊华”的象征。

朝鲜王朝在明清更替之时，被迫由明朝藩国变成清朝藩国，在性理学影响下，朝鲜君臣高举“尊周思明”的大旗，将清朝视作夷狄，而强化跟逝去明朝的关系，视作明朝以来中华正统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他们在祭祀明朝皇帝之同时，也承担对中华忠烈的祭祀，更加强化他们高举中华正统大旗的责任感，进一步宣示他们为中华正统的唯一继承者。甚至传说文天祥后人在明清更替之后，东渡到了朝鲜半岛。“今文文山之后，避地东土，流离颠连，不绝如缕。”[③] 不管事实如何，这种说法为朝鲜增添更加强烈的使命感。当英祖经过与朝臣多方角逐，才最终将大报坛祭祀对象扩展到明太祖和崇祯帝。尘埃方定，半年之后，燕行使从北京带回了文天祥的画像，引起英祖又一番责任感。朝鲜君臣对于文天祥忠诚事迹了如指掌，英祖当即要为文天祥建庙崇祀，经不住朝臣反对，只得将其画像入卧龙祠，使之扩展为三忠祠，这更加增添了此祠中华正统的象征意义。文天祥被羁押大都，三年不死，他所忠的正是中华正统，而并非早已灰飞烟灭的大宋王朝。朝鲜英祖国王崇祀文天祥的画像，更强化了这样的意义，因为朝鲜君臣将其视作中华正统的维护者与殉道者，从朝鲜当

---

① 正祖：《弘斋全书》卷 21《肃庙御制赞武侯、岳王、文山图像，移奉于永柔三忠祠时，致祭文》，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 262 册，2000 年，第 328 页。

② 赵璥：《荷栖集》卷 9《永柔县三忠祠纪事碑铭（并序）》，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 245 册，2000 年，第 390–391 页。

③ 成海应：《研经斋全集续集》第 12 册《题方氏本末记略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 279 册，2001 年，第 251 页。

时所处的时空环境中，去重塑文天祥的形象，这正是三忠祠崇祀文天祥的现实意义，是朝鲜王朝“尊周思明”意识的又一种表现。

References

Park Hyun-kyu. “Hanguo Zhuge Liang miaoyu de youlai yu xiangkuang” (Origin and current conditions of Zhuge Liang Temple in South Korea), *Chongqin ligongdaxue xuebao*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 (2015).

Sun Weiguo, *Daming Qihao yu xiaozhonghua yishi: chaoxian wangchao zunzhou siming wenti yanjiu ,1637−1800* (The Great Ming flag and the Little China’s ideology: on the problem of Choson’s revering the Zhou and missing the Ming , 1637—1800).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2007；Revised Edition, Chengdu: Sichuan Renmin Chubanshe, 2021.

Sun Weiguo. “Lishi shuxie yu xianshi suqiu: chaoxian wangchao Hong Qixi *Wenshan xiansheng xiangzhuan* kaoshi” (The textual interpretation on Hong Gye−hui *Wenshan Xiansheng Xiangzhuan* of the Choson Dynasty). *Shijie lishi* (Journal of the World History) 2 (2022).

Loyalty and Orthodoxy: On the Recognition and the Worship of Wen Tianxiang in Choson Dynasty

SUN Weiguo (Faculty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sunwgx@126.com)

Abstract: Wen Tianxiang was a famous loyalist figure in Chinese history, who was revered in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who also became a respected figure of the Choson Korean dynasty. *The Full Collection of Wen Tianxiang* was published several times in the Choson dynasty. Choson Kings and ministers were familiar with Wen Tianxiang’s life story, which became the topic of their discussions, but also often became one of the comparative subjects of the Korean historical figures. Cho Hyeon-myeong, a Choson envoy to Beijing brought back a portrait of Wen Tianxiang in 1750. After a series of five deliberations, the Choson King Injo finally placed it in Temple Wolong built in the King Seonjo period in Yong-yu County, together with portraits of Zhuge liang, and Yue Fei. Afterwards the temple changed its name to “Three Loyalists Temple” and it became an important place for Choson Koreans to worship the Chinese martyrs. The Temple Wolong had the same significance to the Choson Korean Royal Family’s a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aebodan Altar to revere the late Ming Emperors. The Temple Wolong was another important symbol of the late Korean Dynasty, which proclaimed that the Choson Korean Dynasty promoted the spirit of loyalty, and adhered to Chinese concepts of orthodoxy.

Keywords: wen tianxiang, zhuge liang, wolong temple, chinese orthodoxy, history of sino-korean relation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